

文化传统与当下

→当下小文谈

城镇化是“天大的问题”



○叶小文：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著名学者，著有《小文百篇》、《多视角看社会问题》、《化对抗为对话》等多部著作，本栏目特邀顾问。

●编辑：王慧
●美编：马晓迪

□叶小文

当下，在中国，什么问题最大？城镇化。这是个“天大的问题”。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个农民为主体、农村占多数的国度，因此，中国的基本问题一直是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农业问题。在中国，闹革命，成功的基础必定是“土地革命”；搞现代化，成功的基础归根结底是农民、农村、农业的现代化。说到底，是农村，而不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但现代化过程，一定意义上就是一个农村变城市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加速城镇化的过程。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当前，我国正在大力实施城镇化。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早年的成名之作，就是他的皇皇巨著《江村经济》。这本书最初是用英文写的，题为《中国农民的生活》。费先生晚年的经典之论，则是《小城镇，大问题》。在当代

中国城镇化刚刚起步的时候，他就敏感地意识到这将是引起中国翻天覆地变化的大问题，必须走出一条新路，中国特色的“小城镇建设”之路。

可惜费先生走了，否则，今天他一定会再度呼喊：城镇化其实是“天大的问题”！

城镇化是把好剑，一把拉动内需，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利剑。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时期，最大的内需也在城镇化。如果城镇化率达到65%，可新增两亿多城镇人口，其居住、生活、就学、就业都会创造巨大的经济需求，为扩大消费和投资提供强大、持久的动力。城镇化有利于实现

产业结构调整，推动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业，商贸、餐饮、旅游等消费型服务业和金融、保险、物流等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中国城镇化创造的市场需求之大，举世罕有其匹。美国

有经济学家说，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

展进程的两件大事。但城镇化是把双刃剑。联合国一份报告指出，虽然城市面积只占全世界土地总面积的2%，却消耗着全球75%的资源，并产生了更大比率的废弃物。城市化极可能是无可比拟的未来光明前景之所在，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灾难之凶兆。

问题是，中国的城镇化是在时空压缩中进行的，加之规模巨大，萝卜快了不洗泥，我们或许来不及冷静思考、科学抉择、认真规划、兴利避害，就要闻鸡起舞、挥剑疾舞，甚至金蛇狂舞。

世界城市化可抽象为两个时空进程：

一个是西方主导的进程，从1820年到1980年，时间160年，空间从24万平方公里扩展到3700万平方公里，卷入的人口从约2000万增加到约14亿。这是一个逐渐传导和扩散的时空过

程，城市化中不断产生的利益冲突、结构失衡、制度矛盾等等，在这个相对宽松的时空过程中释放、缓和和修复。

另一个则是在中国大陆发生的进程。时间，1980年到2010年的30年间；空间，960万平方公里。与前者相比，时间和空间分别压缩了5.3倍和3.9倍，卷入进程的人口则从9.8亿增加到13.4亿。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已达6.7亿，占总人口的49.68%。而且，农业中国9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胡焕庸线(400mm降水线)以东约一半的国土上，这是自然和历史的千年演变形成的，中国城市化的加速过程主要发生在这个本来就拥挤的空间里。

中国的城镇化像是在一个高度挤压和紧张的时空反应釜中进行。尽管有幸发生于和平安定的环境中，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做保障，但在创造奇迹的同

时，时空压缩下的“历时性矛盾共时性承受”，也催生并堆积着大量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问题、矛盾和风险。

近十几年来，墨西哥由于“过度城市化”，农业比较优势逐渐丧失，农民“被城市化”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失衡。阵痛还在，教训深刻。

那么，中国的城镇化是否就要缓行，“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呢？当然是不是。

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遵循城市发展规律，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坚持科学规划，严格管理，注重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因地制宜，分步推进，把有稳定劳动关系并在城镇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中国的城镇化，定能“先圣按剑起，叱咤风云生”，“慷慨倚长剑，高歌一送君”。

□高广永

子贡喜欢扬人之善。有一次跟孔子在一起闲谈众弟子的学习情况，师徒有这样一段对话：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意思就是：你跟颜回相比谁更优秀呢？子贡就回答：我端木赐哪里敢跟颜回比呢？颜回听说一件事便能推知十件事，而我只能推知两件事情罢了。孔子说：是不如他，我赞同你说的，不如他。从这一段对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子贡的品格，不矜功更不矫情，把自己的身段放得很低，却把别人的成绩说得极高，其实在这种谦逊的情况下不会使自己变得渺小，反而会让你的形象高大起来。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叔孙武叔毁孔子的为人和学问。这话传到了子贡的耳朵里，子贡便对叔孙武叔说：“这样做是没有用的！仲尼是毁谤不了的。别人的贤德好比是个小土丘，还可超越过去，仲尼的贤德好比太阳和月亮，是无法超越的。虽然有人要自绝于日

子贡的语言艺术

在孔子受业身通的七十二位大弟子当中，子贡应该算是最为能言善辩的二位弟子之一了。另一位是宰予。子贡位列孔门十哲的言语科，那他在言语上究竟有什么出色之处呢？

月，对日月又有什么损害呢？只是表明他不自量力而已。”这段话不仅表现了子贡对老师孔子的仰慕和尊敬之情，更体现了子贡高超的语言艺术。只有寥寥数言便让孔子的形象如日中天，有谁能再用别的比喻超过孔子的高度呢？

还有一次，弟子们认为孔子有学问有境界，可就是不愿出来做官做事，不愿为天下所用，所以就公推子贡来劝说老师孔子。子贡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韞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子贡见到孔子并没有直接劝说孔子应该以天下苍生为念，一类的官话套话，那样也许一句话就让老师给堵了回去，子贡先是跟孔子打起了比方，他说：这里有一块精美的玉，是把它藏在柜子里呢，还是让那些识货的商人把它卖了？孔子就回答说，要卖，要把它卖了。我是等待着那些识货的人来，等到那些真正认得美玉的人来买啊。这是很重要的。孔子并不是不愿意出来为天下做事，而是等待时机。要用，但是要有选择地用。古代人用玉比喻君子，君子的品格像玉一样温润华美。这种赞美会让所有的人都笑逐颜开，想来孔子也是不能免俗的。一句话就能让老夫子开心不已，这水平也许只有子贡有吧。先把您老人家的耳朵给理顺了，心情自然就会大好，再跟您说什么，也不会招致一顿猛烈的回击了，对话的双方把自己的意思都表达出来，而且还都能开开心心，这正是子贡所具有的高超的谈话艺术。

→感悟经典

亲在，让文化活起来

□何中华

《老子》中的“道经”一上来就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句听起来颇为玄妙的话，意思是：能够说得出的那个道，就不再是我所追求的恒定不变的道了；能够叫得出的那个名，也不再是我所探究的恒定不变的名了。

“道”的本来的意思就是道路。这一义最朴素，其意蕴亦最丰富最深刻。入道需要参与其中，不可离“道”而旁观。古人云：“鸭子饮水，冷暖自知。”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也说：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这些说法，都是旨在强调“亲在”状态。什么叫做“亲在”？比如父母无论怎样疼爱自己的孩子，当孩子生病时也无法代他去承受病痛，在孩子学习不理想时也不能替他去学习。这种他人不可替代，只能自己亲身感受、亲自体验的状态，就是所谓的亲在。一个人的这种体认性的存在，是难为外人道的。

老子所暗示的这个道理，当然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解读和发挥，但无疑凸显了中国文化所特有的体认方式，这是它的一个重要的诠释向度。在这里，我更愿意把这个含义拿来作为领会我们自己所拥有的文化传统的启示。

晚清以来中华民族的受挫，使我们对本土文化缺乏自信。但对自己文化传统的态度有所偏失，不能不说是缺乏自信的一个内在原因。在不少人的印象里，中国文化传统不过是供我们拿来解剖、切割、组合和搭配的外在对象，是我们的身外之物，而不是渗透在我们骨子和血液里的活的命脉。如此一来，我们要想重新亲近自己的传统，就只好从外部去着手。这种态度是很不恰当的。

梁漱溟先生早就说过：“一家民族的文化原是有趋往的活东西，不是摆在那里的死东



晚清以来中华民族的受挫，使我们对本土文化缺乏自信。但对自己文化传统的态度有所偏失，不能不说是缺乏自信的一个内在原因。

西。”钱穆先生同样强调：“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有了这种态度，“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其核心精神，就是“对国家、对民族、对整个文化传统，要有一个宽大的胸襟，要有一番恳挚的感情”。

问题是，怎样才能对于本土文化传统持一种“温情与敬意的了解”呢？只有达到“亲在”状态，这才是可能的。文化传统是有生命的，是“活”的，不是“死”的，决不是老古董。使文化传统的这种生命活性彰显出来的关键，在于我们对它采取的态度是否恰当。1958年，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勱、唐君毅联合发布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其中最

为要紧的贡献在于确立了对文化作生命观的恰当态度。它指出：“我们首先要寻求：中国与世界人士研究中国学术文化者，须有肯定承认中国文化之活的生命之存在”，坚决反对那种“凭吊古迹”的态度。否则，“中国之历史文化，在他们之前，必然只等于一堆无生命精神之文物，如同死的化石”。

牟宗三先生认为区分了对待历史和文化的两种态度：一种是“把文化推出生命以外视为外在的材料，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讲孔子耶稣，亦视为外在的东西，视为外在的东西，完全与人不相干，与生命不相干，与人格不相干，他们才好从事排比爬梳，作历史的考据，美其名曰科学方法……但是这样一来，则历史文化毁灭，孔子耶稣死矣”。这显然是旁观者的立场和视野。

另一种是“把文化收进来，落于生命上，落于生活上。看历史文化是圣贤豪杰精神之表现，是他们的精神之所贯注；看圣贤豪杰是当作一个道德智慧的精神人格来看。在这种态度下，历史文化可以保住而复其真实性，孔子耶稣可以不死而在我们当下生命中起作用，因此，文化意识自然油然而生，沛然莫之能御”。可以说，前一种是对象性的，旁观式的认知态度，它所捕捉到的只能是“死”的“物”，而非活生生的人及其文化和历史。后一种态度才是体认式的，亲在的，亦即从内在的方面，采取非对象性的角度，对于人及其文化生命的彰显。

文化只有在我们的这种“亲在”中才能“活”起来，变成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流。就像黄河在历史上虽几经改道，却依然不失为“黄河”一样，我们的文化传统在迎接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和损益的嬗变过程中，始终不变的依然是它的命脉和品性。(作者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美在蓬莱阁
有奖征文大赛